

日治時期 臺中林氏宗祠的創建*

黃秀政**



臺中林氏宗祠（楊活源拍攝）

* 本文為《台灣中部林氏宗族的發展》研究計畫成果報告之一部份。該研究計畫係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中部辦公室與財團法人台灣省台中林氏宗廟委託，由本人擔任計畫主持人。研究計畫執行期間，承蒙協同主持人鄭喜夫委員，專責研究人員林鉦昇先生、林紋如小姐，以及前行政院文建會中部辦公室李西勳科長的協助，得以順利完成，特此致謝。

** 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摘要

林姓為台灣第二大姓。台灣中部台中市、台中縣、彰化縣及南投縣四縣市之地，自明末清初之際，即陸續有自閩、粵兩省東渡進入開發拓墾的林氏族人，他們在此生息繁衍，並從事開發。隨著遷台日久，清代中後期與日治時期台灣中部各處聚居的林氏族人先後發展成若干規模不一的家族或宗族。這些家族或宗族不但對台灣中部的開發各有貢獻，對台中林氏宗祠的創建亦多出錢出力，貢獻良多。

台中林氏宗祠的前身為清代的林祿公祠、林尚親堂；現存林氏宗祠的創建始於大正六年（1617）。林氏宗祠自創建以來，管理組織歷經多次變革：由大正六年初定的總理制，到大正八年的委員長制及理事長制，再到昭和十年以後的管理人制，組織相當健全。宗祠對祭祀活動與編修族譜均甚重視，各族親透過參與宗祠的祭祀活動，不但體現了慎終追遠的傳統美德，並且發揮凝聚宗族的作用，達到鞏固族親的目的。台中林氏宗祠的創建，對日治時期台灣中部林氏宗族的發展，實具有重要的意義。

關鍵詞：祭祀 家族 林尚親堂 林氏宗祠



一、前言

祖先祭祀與宗祠創建，在中國可以追溯至商、周兩代。商代甲骨卜辭中出現大量的「祭祀禱文」，即是在「示」（寺）中所舉行的儀式上宣讀。根據《詩經·文王之什·綿》記載，太王古公亶父一到周原，即命百官有司，發動人民，建立宮室、宗廟、大社；¹周原出土的周代甲骨刻辭中也有「祠，自蒿於周」的記載，表示周武王從鎬京往岐山周原先王宗廟，進行春祭活動，凡此充分說明宗祠的歷史與漢人宗族的歷史一樣悠久。祖先祭祀活動可說是宗族存在的基本標誌，也是它的基本價值所在，古人甚至有所謂「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廡庫為次，居室為後。」²的說法，顯示對宗祠建築的重視。

台灣的宗祠、祠堂的興築，與移民社會的發展有密切關係。漢人常以族產和宗祠表達對祖先的崇敬，在台灣這類族產稱為「祭祀公業」。³清代初期，漢人移民在台灣大多數只做暫時居留的打算，後來雖逐漸定居下來，但對祖先的崇拜，往往是由在台之宗族成員集資派人前往原籍辦理。經過一段較長時間的定居後，漸感回原籍祭祀之不方便，而且在台之宗族成員也繁衍不少，其中有能力或有功名者，遂倡導興建祠堂，設置公業。這種現象，正顯示他們已經決定把台灣當作永久的故鄉。漢人的移民台灣，到了晚期有些移民甚至背著神主牌渡海來台。同樣的，當有足夠的宗族成員重新在台灣相聚時，他們便有機會重新建立一個與祖籍之宗族類似的組織。台灣祭祀公業的大量設置多在清道光以後，並在同治、光緒年間達於極盛。1895年（清光緒21年，日明治28年），日本殖民統治之後，台灣的漢人社會已呈現穩定的現象，

1 《詩經·文王之什篇》云：「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見吳樹平等點校，《十三經注疏》（中國北京：燕京出版社，1991年12月），頁340。

2 《禮記·曲禮下第二》，吳樹平等點校，《十三經注疏》，頁648。

3 所謂祭祀公業，係以死者之祭祀為目的，以土地為基礎所設定之獨立財產之謂。見姉齒松平原著、程大學等編譯，《日據時期祭祀公業及在台灣特殊法律之研究》（台灣台中：日本東都書籍株式會社藏版，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1983年6月），頁2。



祭祀公業大量增加，宗廟、祠堂的興築也隨之普遍。宗廟、祠堂成為各宗族聚會的中心，是台灣文化的特色之一。

台灣中部的林氏宗祠，雖不是台灣最早的宗祠組織，但其歷史久遠，規模宏大，最可貴的是興建的背景、年代史實清楚，廟宇建築宏偉精巧，為日治時期台灣宗祠的代表建築之一。本文的研究，旨在探討日治時期台中林氏宗祠的創建及其意義，作者期盼透過本文的探討，能有助於讀者對閩粵林氏宗族的入墾台灣、台灣中部林氏宗祠的相關衍派、台中林氏宗祠的創建經緯，以及台中林氏宗祠的組織與活動，獲得進一步的了解。

二、林氏入台與台灣中部林氏宗族的衍派

（一）林氏入台

林姓為台灣第二大姓，在中國則為第十三大姓。⁴ 林氏宗族在晉永嘉之亂（311）以前，主要分佈在長江以北的山東、河北、河南、山西、陝西、甘肅等地。其後因五胡亂華，中原板蕩，晉室南遷建康，中原士民相率南渡，此時濟南林穎家族亦隨之南徙下邳。晉明帝太寧三年（325），林穎次子林祿，任晉安太守，遂遷居侯官縣都西里，林氏宗族入閩自此開始。此後，林氏宗族除居於中原地區外，晉安林氏亦不斷地繁衍發展，許多房派或北遷溫州、台州，或南徙閩南、廣東等地。至明代，林氏已散居中國各地。其中，福建的林氏宗族人才輩出，福建的林姓名人占當時中國林氏名人總數的70%，顯示明代福建是林氏宗族發展最為繁盛的地區。⁵

明末清初以降，福建、廣東兩省因山多田少，無法供養龐大的人

4 楊緒賢，《台灣區姓氏堂號考》（台灣台中：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79年6月），頁14～15；另參閱李棟明，〈台灣人口姓氏分佈之研究〉，《台灣文獻》，第27卷2期（1976年6月），頁141。

5 見黃秀政計畫主持，《台灣中部林氏宗族的發展·期末報告書（上冊）》（台灣台中：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中部辦公室與財團法人台灣省台中林氏宗廟，2001年2月），頁54～55。



口，造成極大的人口壓力。⁶ 而與福建一水之隔的台灣沿岸，自明代中葉以來即成為閩南漁民重要的漁場和中日走私貿易的聚合站。⁷ 因此，閩人對台灣的地理環境已有相當的認識，有助於閩人向台灣發展，建立漢人來台活動的基礎。再加上台灣氣候溫和，未開發的土地極多，土壤肥沃，謀生較易。誠如高拱乾《台灣府志》載：「（台灣）地氣和暖，無胼手胝足之勞，而禾易長畝，較內地之終歲勤者，其勞逸大異，此台農之足樂也。」⁸ 由於台灣社會民豐物阜，自然成為生活困頓的中國大陸沿海居民嚮往的新天地。

此外，荷蘭人占領台灣（明天啟四年，1624）後，需要一大批勞力來從事糧食生產，故設法吸引漢人移民來台。適值中國大陸動亂不安，加上荷蘭人提供優惠的條件（如：免稅、提供土地和生產工具等），漢人乃相繼移民來台，至明永曆三十七年（1683）時，今台南地區的漢人即增加一倍。⁹ 隨著漢人入台開墾，台灣的漢人社會也逐漸的成形。在此之前，永曆十六年（1662），鄭成功驅逐荷蘭人後，為解決嚴重的軍糧問題，乃積極從事土地拓墾。然土地開發與糧食生產皆需要大量的勞力，鄭氏增加勞動力的方法主要有三：一是推行寓兵於農政策；二是嚴令將士的眷屬遷台；三是招納大陸沿海流民來台。¹⁰ 鄭氏時期，大規模的移民與有計畫、組織的開發行動，奠定漢人移墾台灣成功的基礎。清領台灣後，台灣日趨富庶繁榮，充滿發展的機運，而中國大陸大亂方止，亟待休養生息，閩粵人乃「襁至而輻輳」，相繼來台謀

6 中國人大量移民南洋的時間大約始於明中葉。至於中國人何時開始移民台灣的問題，目前尚有爭議。不過可以確定的是，遲至明嘉靖年間後，已確知台灣的存在，漁、商船也開始往來通販，而較具規模的移民則始於荷據時期（1624～1662）。參閱曾少聰，《東洋航路移民：明清海洋移民台灣與菲律賓的比較研究》（中國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11月初版），頁51～52；黃富三，〈清代台灣之移民的耕地取得問題及其對土著的影響（上）〉，《食貨月刊》復刊第11卷1期（1984年4月），頁20。

7 曹永和，〈中華民族的擴展與台灣的開發〉，收於氏著，《台灣早期歷史研究》（台灣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79年7月初版），頁9。

8 高拱乾（清），《台灣府志（第三冊）》（台灣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文獻叢刊第六五種，1960年2月），卷十，頁244。

9 張勝彥、吳文星、溫振華、戴寶村著，《台灣開發史》（台灣台北：國立空中大學，1996年1月初版），頁51。

10 曹永和，〈鄭氏時代之台灣墾殖〉，《台灣早期歷史研究》，頁272。



求發展。¹¹

有關明末至清代，遷台林氏族人原居地的分佈狀況，根據目前所蒐羅到的394位林氏族人之祖籍統計，以福建籍最多，占總人數的68%；廣東籍次之，占總人數的19%；浙江籍僅有1人；祖籍地未明者有53人。祖籍福建的林氏族人中，以來自漳州府者最多，占總人數的45%；泉州府次之，占總人數的20%。祖籍廣東的林氏族人，則以潮州府人最眾，占總人數的12%；嘉應州次之，占總人數的5%。如以縣為單位，檢視來台之林氏族人的祖籍地，則以福建漳州府平和縣之人數最眾，占總人數的14%；其次為福建漳州府漳浦縣人與廣東潮州府饒平縣人，各占總人數的10.1%；又次為福建泉州府安溪縣人，占總人數的9.9%，其餘依次為福建漳州府南靖縣、福建漳州府詔安縣、福建漳州府龍溪縣、福建泉州府同安縣、廣東嘉應州鎮平縣、福建泉州府晉江縣。¹²

由上述可知，明末清初以降，閩粵地區林氏族人大量來台，其中尤以福建省的漳州府與泉州府以及廣東省的潮州府為多。他們在中國大陸乘船渡海的港口，主要是界於惠安至汕頭之間，因為這些港口位於春夏間往台順風、順流的有利位置；而其登陸台灣的港口，則依其航線分於台灣北、中、南部或東北部諸港上岸。至於林氏族人來台的時間，始於明崇禎末年，隨著移居人數漸次增加，至清乾隆朝達到高潮，嘉慶以後自中國大陸來台者逐漸減少。林氏族人在台灣的分佈，大致與台灣開發的方向相似，呈現先南後北，先西後東的順序。不過清康熙至嘉慶朝（1684～1820），台灣中部一直都是林氏族人最主要的發展區域。

（二）台灣中部林氏宗族衍派

林姓為台灣第二大姓，約佔台灣總人口數的8%。就台灣中部台中市、台中縣、彰化縣及南投縣四縣市而言，林姓亦高居各縣市的前三大

11 尹章義，《張士箱家族移民發展史：清初閩南土族移民台灣之一個案研究（1702～1983）》（台灣台北：張士箱家族拓展史研纂委員會，1983年7月），頁16。

12 黃秀政計畫主持，《台灣中部林氏宗族的發展·期末報告書（上冊）》，頁84。



姓。台灣中部林氏宗族各宗支，其派下成員有進主到台中林氏宗祠之宗族相關衍派，依祖籍地可分為三個部分：一、祖籍為福建省漳州府地區者；二、祖籍為福建省泉州府地區者；三、祖籍為廣東省潮州府地區者。因為根據現有資料顯示，祖籍為福建省其他地區者與廣東省嘉應州、惠州府者不在宗祠相關衍派之列。¹³

台中林氏宗祠相關人員的祖籍地，以福建省漳州府平和縣者最多。而這些支派所屬派系，其可上溯血緣者，以萍公衍派最眾。林萍（林堅派下第八十世）為福建省漳州府漳浦縣開基祖，林和孝（林堅派下第八十二世）與林和義（林堅派下第八十二世）皆為其孫。而宗祠相關人員中，屬和孝公衍派者有：崇謙公派下、簪公派下、局公派下、成公派下、大伯公派下；屬和義公衍派者有：維垣公派下、石公派下、摠公派下、大鵬公派下。

另外，經由各宗族衍派相關資料的整理，可知台中林氏宗祠的成員在系譜上的關係親疏不一，甚至有部分成員無法確定彼此在系譜上是否有直接的關係。由於部分宗祠成員的血緣關係並不明晰，宗祠為了使所有成員的先祖皆有奉祀機會，乃以比干、林堅等遠祖作為共同奉祀的對象，故台中林氏宗祠成員屬於「合約字」祭祀團體¹⁴，亦稱為「唐山祖」宗族組織。¹⁵然而在宗祠的相關衍派中，有些家族另以其渡台始祖或其他祖先作為奉祀對象，組織祭祀公業或建立祖祠，這一類的祭祀團體稱為「鬪分字」祭祀團體（或「渡台祖」宗族）如：大鵬公派下成立「祭祀公業林金源吉」；子慕公派下成立「祭祀公業林合興」；石公派下成立「祭祀公業林甲寅公」、「祭祀公業景山公」、「本堂公產業株式會社」；簪公與局公派下共同成立「祭祀公業林敦厚公」與壺山祖祠「敦厚堂」；成公派下成立「祭祀公業七德公」、「祭祀公業三

13 同前註，頁93～94。

14 田井輝雄（戴炎輝），〈台灣の家族制度と祖先祭祀團體〉，收於山中彰二等著，《台灣文化論叢（第二輯）》（台北市：清水書店，1945年），頁231。

15 陳其南，《台灣的傳統中國社會》（台北市：允晨出版公司，1986年10月二版三刷），頁143～144。



益公」；大伯公派下成立「祭祀公業林大伯公紹復堂」與祖祠「紹復堂」；薦公派下成立「祭祀公業林雙美公」；國前公派下成立「祭祀公業林德記」。¹⁶

三、林氏入墾台灣中部與宗祠的肇建

（一）林氏入墾台灣中部

日治以前，林氏宗族入墾台灣中部，按時間先後可分為三個時期來探討：第一期為鄭氏時期，自鄭成功入台至鄭克塽降清為止（1661～1683）；第二期為清代初期，自清廷領台至乾隆六十年（1683～1795）；第三期為清代中後期，自嘉慶元年至甲午敗戰割讓台灣為止（1796～1895）。以下分別加以論述。

1、鄭氏時期（1661～1683）

林氏宗族入墾台灣中部，最早可上溯到鄭氏時期。明永曆十五年四月（1661年4月），鄭成功入台。同年十二月（1662年2月），將荷蘭人逐出台灣。同時，鄭成功為解決嚴重的軍糧問題，乃行寓兵於農的屯田之法，僅留勇衛、侍衛二旅，鎮守安平、承天二處，其餘諸鎮營分赴南北開墾，使野無曠土，而軍有餘糧；¹⁷並命五軍、果毅各鎮赴曾文溪之北，前峰、後勁、左衝各鎮，赴二層行溪之南，各擇地屯兵，插竹為社，斬茅為屋。十六年（1662），鄭成功逝世，其子鄭經繼延平王位。十八年（1664），鄭經入台，諮議參軍陳永華善治國，曾親歷南北各社，相度地勢，建議鄭經再行屯田制，分土地給諸鎮開墾，使戍守之兵衣食豐足，農隙則訓以武事；有警則荷戈以戰，無警則負耒以

16 黃秀政、鄭喜夫、林紋如、林鉦昇訪問，林紋如、林鉦昇紀錄，〈宗廟董監事及相關人員訪談紀錄〉，收於黃秀政計畫主持，《台灣中部林氏宗族的發展·期末報告書（附冊）》，頁32～164。

17 江日昇（清），《台灣外記》（台灣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文獻叢刊第六〇種，1960年5月），頁206～207；連橫，《台灣通史·建國紀》（台灣台北：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85年1月校正修訂版），頁31。



耕。¹⁸

自永曆十五年（1661）鄭成功頒行屯田制起，至三十七年（1683）鄭克塽降清為止，鄭氏部將在台灣的拓墾範圍大致以承天府（今台南市區）、安平鎮（今台南市安平區）附近的文賢、仁和等二十四里為中心，漸次向南北開展。以上除承天府、安平鎮和二十四里外，其餘南北各地之拓墾，大多呈點狀的分佈。¹⁹

根據現有的史料來看，林氏族人進入台灣中部發展，應始於明永曆十八、九年間林圯率眾入墾水沙連並建立竹圍仔莊。²⁰ 自此起至永曆三十七年（1683）鄭克塽降清為止，相繼有林新彩、林萬、林虎、林超與林神在等進入林圯埔開墾。在這十九年間，這些林氏族人之所以會選擇進墾林圯埔，其原因與林圯埔當時的特殊地理位置有關。北上漢人經由陸路進墾林圯埔遠比橫渡虎尾溪北上彰化平原來得容易，加上林圯埔除有軍隊駐守外，亦有許多漢人在此從事墾殖，漢人移民來此拓墾，能得到較佳的生命財產保障，故造成了鄭氏時期林氏宗族在台灣中部的活動完全集中在林圯埔一帶的特殊現象。

2、清代初期（1683～1795）

清康熙二十二年（明永曆三十七年，1683），鄭克塽降清。次年，清廷詔設台灣府，正式將台灣納入版圖。清廷領台後，除將鄭氏族人與軍民遣還中國大陸，並嚴格限制中國大陸人民來台，使台灣人口頓時銳減，到處呈現人去業荒、井里蕭條的荒涼景象。台灣中部亦不例外。此外，為防止因漢「番」接觸而造成的衝突，乃劃分漢「番」界線，並重罰私入「番」界的漢人，以隔離漢人與原住民的生活空間。²¹

18 連橫，《台灣通史·建國紀》，頁34；連橫，《台灣通史·陳永華列傳》，頁722。

19 張勝彥等著，《台灣開發史》，頁86。

20 劉枝萬編纂，《南投縣人物志》（台灣南投：南投縣文獻委員會，南投文獻叢輯第九種，1962年），頁1。

21 例如：「凡偷入台灣『番』境及偷越『生番』地界者杖一百，偷越深山抽藤獵鹿伐木採稷者杖百，徙三年，台灣奸民私墾『番』埔地者，依盜耕本律問擬；於『生番』界內私墾者，依越渡關塞律問擬；田仍歸『番』。」見周憲文，《清代台灣經濟史》（台灣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研究叢刊第四五種，1957年3月），頁13。



然而清政府一連串政策的施行，非但無法防止漢人與原住民之間衝突的產生，同時也使得那些在原住民活動區進行開墾的漢人，必須面臨遷移他處或違抗法令繼續留在原地拓墾的兩難抉擇。而這些政策亦深刻地影響清代初期林氏族人在台灣中部的拓墾。

茲為探討林氏族人在台灣中部各地區的拓墾，以下依現行的行政區劃將台灣中部地區分為南投縣、台中縣市與彰化縣三部分，透過林氏族人進入中部各區的時間與拓墾情形的記載，以了解清代初期林氏族人在台灣中部拓墾的狀況。

（1）南投縣地區：南投縣位處山區，灌溉用水的取得原已不便，入墾的漢人除犯有「偷入『番』境」的罪名外，還得在沒有政府軍隊的協助下自行防備原住民的威脅。在這樣極度不利的條件下，康熙中期以前進入本區開墾的林氏族人人數較鄭氏時期減少很多。根據現有資料顯示，此時入墾本區的林氏族人僅有福建漳州龍溪人林格與南靖人辜姓於康熙二十八年（1689）同墾沙連堡大坑莊（今竹山鎮一帶）²²，以及平和人林寬與林必錦拓墾林圯埔一帶。²³ 而他們入墾的地點都是在鄭氏時期已有漢人進行拓墾的林圯埔地區。

自清康熙二十二年至乾隆六十年間（1683～1795），入墾本區的林氏族人，若以祖籍來分類，係以福建省漳州府人最多，佔總數的88%。這些林氏族人放棄西部平原，而進入本區山地拓墾的動機，因缺乏相關資料，無法提出足夠的說明。地理學者施添福認為造成清代在台漢人祖籍分佈的基本因素是：「移民原鄉的生活方式，亦即移民東渡來台以前，在原鄉所熟悉的生活方式和養成的生活技能。」²⁴ 施氏的說法，也許可以提供一部分的解釋。

22 莊英章，《林圯埔：一個台灣市鎮的社會經濟發展史》（台灣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專刊乙種第八號，1977年），頁28。

23 楊緒賢，《台灣區姓氏堂號考》（台灣台中：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79年6月），頁184。

24 施添福，《清代在台漢人的祖籍分布和原鄉生活方式》（台灣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1987年），頁180。



(2) 台中縣市地區：林氏宗族到今台中縣市之拓墾，就目前的資料言，始於清康熙四十年（1701），閩籍林姓族人與張姓、粵籍邱姓等人率眾佃開拓大甲附近的大安莊、三十甲莊（皆在今大安鄉）、九張犁莊（今大甲鎮）及鐵砧山腳莊（今外埔鄉）等地。²⁵ 林氏宗族到台中地區拓墾的時間比南投地區晚了三十七年，其原因似與台中地區交通不便，清領以前漢人罕至有關。由於在荷據時期與鄭氏時期，台灣的政治、經濟重心皆在南部；而台灣中部的的主要河川，如濁水溪、大肚溪、大甲溪等全為東西走向，夏季溪水暴漲的河床，對那些自南部北上墾殖的民眾來說，橫渡河川無疑為驚險的考驗。由於這些自然環境的阻礙，使得台中地區至康熙中葉仍多屬蠻荒之地，如康熙三十六年（1697）郁永河遊歷其地記載：「至大肚社，一路大小積石，車行其上，終日蹭蹬殊困；加以林莽荒穢，宿草沒肩，與半線以下如各天。」²⁶

就目前資料顯示，清初康雍乾時期入墾台中地區的林氏族人祖籍，福建省漳州府籍者佔總數的69.7%，其中以平和人最多；廣東省籍者佔30%，以潮州府饒平縣人最多。漳州籍林氏族人在台中地區的分佈，大致以今台中市及周圍台中縣的大里市、潭子鄉、豐原市等鄉鎮市為主。而廣東省籍林氏族人的分佈情況則較漳州籍者集中，大多在台中盆地的東半部，如今之豐原市、神岡鄉、石岡鄉、東勢鎮等地區進行墾殖。至於泉州籍林氏族人則主要在今之清水鎮一帶發展。²⁷

(3) 彰化縣地區：林氏宗族入墾今彰化縣的時間和林氏進入台中地區的時間一樣，皆遲至康熙中期。導致此一現象的原因，應是受到自然環境的阻礙，使得漢人移民不易經由陸路自南部北上。至康熙中期以後，中國大陸地區人民開始經由海路自鹿港登陸，然後再進入彰化平原

25 洪麗完，〈清代台中開發之研究（1683～1874）〉（台灣台中：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5年6月），頁60～61。

26 郁永河（清），《裨海紀遊》（台灣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文獻叢刊第四四種，1956年）卷中，頁19。

27 黃秀政，〈林氏宗族與清代台灣中部的開發：以台中林氏宗廟相關衍派為中心〉，《興大歷史學報》，第12期（2001年10月），頁115。



拓墾。²⁸

從上述的論述可知，林氏宗族入墾台灣中部，除林圯埔之外，大多始於康熙中期以後。而後進入台灣中部的更不斷增加，到乾隆年間達到顛峰，林氏族人幾已遍及台灣中部各地。²⁹

3. 清代中後期（1796～1895）

台灣中部除了部分山區與近山地帶之外，其餘平原地區於乾隆末年已大致開發完成。清嘉慶初年以後，因台灣西部土地多已開發，中國大陸閩粵沿海地區人民移墾台灣的風氣也趨於減緩。在此背景下，台灣中部林氏族人社會經濟的發展，也面臨到與先前不同的環境。自嘉慶元年（1796）至光緒二十一年（1895）台灣割讓日本為止，林氏宗族在台灣中部的發展日趨穩定，許多家族發展相當成功。以下以三個發展得較好的林氏家族為例，探討此一時期林氏宗族在台灣中部的發展。

（1）大里杙林石家族：福建省漳州府平和縣人林石（1729～1788）於乾隆十九年（1754）渡台，入墾大里杙。³⁰ 歷經二十餘年胼手胝足的墾拓，林石終於成為歲入萬石的地主。乾隆五十一年（1786）爆發的林爽文事件，嚴重打擊林石家族，家產被抄充公。³¹ 五十三年，林爽文案事平後，林石妻陳益娘乃率家人遷居塗城（在今台中縣大里市）。³² 林石諸子中，以長子遜（1762～1783）及四子棟（1772～1830）兩房之發展最好，前者即為聞名全台之霧峯林家，後者則為太平地區重要拓墾者。林爽文事件後，長房林遜妻黃端娘因故獨自攜子遷居阿罩霧。初時家境甚貧，其後林遜次子甲寅（1782～1838）以經商逐漸累積財富，並購地墾拓、伐木燒炭，至道光年間已

28 黃秀政，〈清代鹿港的移墾與社會發展〉，收於氏著，《台灣史志論叢》（台灣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9年6月初版），頁15～16。

29 黃秀政，〈林氏宗族與清代台灣中部的開發：以台中林氏宗廟相關衍派為中心〉，頁117。

30 林獻堂，〈太高祖石公家傳〉，收入林獻堂等修，《台灣霧峯林氏族譜》（台灣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文獻叢刊第二九八種，1971年12月），頁101。

31 黃富三，〈霧峯林家的興起：從渡海拓荒到封疆大吏（1729～1864年）〉（台灣台北：自立晚報社，1987年10月），頁70～83。

32 林獻堂，前揭〈太高祖石公家傳〉，頁103。



為歲入四千石的地主。³³ 甲寅長子定邦（1808～1850）除繼承父業外，亦逐漸在地方上嶄露頭角，擁有一定程度的社會地位。³⁴ 至咸豐年間，霧峯林家一躍成為台灣中部首屈一指的官紳大家。

林石諸子中，除了長子遜一支外，四子棣一系的發展亦甚成功。林棣在林爽文事平後隨母遷居塗城，並開始至太平地區拓墾，經濟狀況乃逐漸好轉。林棣有五子，除五子志芳至太平拓墾外，其餘諸人都留在塗城發展。咸豐、同治年間，志芳與文察等，開始在烏榕（銃）頭（今太平市）大事墾殖。同治元年（1862），志芳獨資開築原野圳（為頭汴坑圳分支），使數百頃荒地變成良田，志芳乃成為太平最大的墾首。其後，林志芳移居東勢仔（今台中市東區），經營東大墩地區，其家族就成為大里溪以北、大坑溪以南（即今太平市及部分台中市東區）的最大墾首；再加上志芳在戴潮春事件後獲賞六品銜，及其後屢任公職（如犁頭店街保安局長、藍興保保甲局首、大墩街建設董事等），志芳家乃成為太平地區最具影響力的家族。³⁵

（2）神岡社口林振芳家族：林振芳（1832～1905），神岡社口人。其先祖林君寵，於康熙末期自原籍廣東省惠州府陸豐縣渡海來台，在大肚山麓「秀水」一帶（今清水鎮秀水里）拓墾。至其曾祖父林惠宗時，始遷至揀東保社口莊，以農為業。林振芳年少躬耕，以力田起家。咸豐五年（1855），轉而從商，於揀東保望寮街建舖，經營雜貨。因經營得法，產業日增，其家產蓋以萬石計。振芳與諸堂弟侄同居，家族兩百餘口，和樂雍睦，為時人所稱道。

同治三年（1864），葫蘆墩汛千總林拔英、揀東上保總理林保定

33 林獻堂，〈曾祖考甲寅公家傳〉，收入林獻堂等修，《台灣霧峯林氏族譜》，頁105。

34 林氏族譜記載定邦曾任連莊總理，而黃富三則認為其應為甲長或鄉甲首。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定邦至少為地方上的頭人，有族人子弟或長工追隨。參閱林幼春，〈曾祖考太封翁家傳〉，收入林獻堂等修，前揭《台灣霧峯林氏族譜》，頁115；黃富三，前揭《霧峯林家的興起：從渡海拓荒到封疆大吏（1729～1864）》，頁115。

35 黃秀政、林鉦昇，〈日治時期林氏宗族在台灣中部的發展：以台中林氏宗廟相關衍派為中心〉，《興大人文學報》，第34期下冊（2004年6月），頁883。



等十數位族人，以林氏宗族人繁事多，同具柬僉舉林振芳為林氏族長，以辦理族務。故時人多稱林振芳為「林家長」或「火家長」。³⁶ 同治年間，林振芳捐納為例貢生。光緒四年（1878），振芳以黔賑經貴州按察使彙奏由例貢生授中書科中書職銜。其後，以晉賑樂輸盡力，乃授同知職銜。林振芳對地方事務的參與甚為積極熱心。

林振芳子林伯璿、林佐璿俱為光緒年間秀才³⁷，在地方上具有相當的地位與影響力，均曾參與台中林氏宗祠的創建，並有所貢獻。³⁸

（3）潭子大埔林林其中家族：林其中（1832～1884）原籍為福建漳州府詔安縣，其祖父林朴直於乾隆五十年（1785）攜弟林詒官至梧棲登岸，後定居於潭子墘大埔厝莊（今潭子鄉大豐村），以墾田耕種兼營商業。³⁹

林其中少即豪傑任俠，以保衛桑梓為己任。咸豐四年（1854），組成鄉勇，投效阿罩霧林文察。後為林文察之前哨營官，隨其赴閩、浙征剿捻亂，歷經建陽、汀州諸戰役，嗣後於太平天國及戴潮春事件，屢建軍功，為林文察的得力助手。同治二年（1863），林其中以軍功四品銜賞戴花翎，並誥授昭勇將軍。其後解甲返台，因繼承王成助的產業，故財產大增，從而向張（達朝）家族購大埔厝（今潭子鄉大富村）一帶之地，成為富甲一方的地主。同治末（1871年左右）鳩工興建「摘星山莊」（或稱其中厝、大豐村大瓦厝），至光緒五年（1879）竣工。⁴⁰

林其中亦熱心參與地方事務，如光緒七年（1881）秋，福建巡撫

36 陳炎正，《神岡鄉土志》（台灣台中：台中縣詩學研究會，1982年4月），頁106～107。

37 許雪姬計畫主持，《台中縣建築發展：民宅篇田野調查總報告書》（台灣台中：台中縣立文化中心，1994年），頁80。

38 台中林氏宗廟，《林氏宗廟獻金裔孫芳名錄（二）》（日昭和七年（1932），鑄刻於宗祠內埋石壁）。

39 台中林氏宗廟，《神牌題字回答書（特等）》（台灣台中：台中林氏宗廟，未刊行）。而《林氏大宗譜》記載其祖籍為詔安縣牛籠村。見林氏大宗譜編輯委員會編，《林氏大宗譜》（台灣台中：台灣省各姓歷史淵源發展研究學會，1985），頁348。

40 陳炎正主編，《台灣傳統建築典範》（台灣台中：各姓淵源學會，1998年），頁28；許雪姬主持，《台中縣建築發展：民宅篇田野調查總報告書》，頁85。



岑毓英欲於大甲溪築八字隄，即由林振芳出任揀東保管帶，林其中為副。林其中曾孫林澄燦、林澄松與林澄科三人曾參與台中林氏宗祠的創建，並有捐獻。⁴¹

此外，潭子東員寶林瑞麟家族、台中旱溪林簪家族、台中樹仔腳林成家族、大里林請家族，以及清水下湳仔林祖源家族等，他們在台灣中部均有很好的發展。各林氏家族彼此之間的往來亦頗為密切，他們均積極參與台中林氏宗祠的創建與活動，其家族成員多進主至林氏宗祠，對林氏宗祠的組織與運作貢獻良多。⁴²

（二）宗祠的肇建

日治以前，林氏宗祠的創建初為「林祿公祠」，繼有「林尚親堂」，其創建經過如下：

1、林祿公祠

台中林氏宗祠的肇建，一般認為創建於清嘉慶年間（1796～1820），其地址位在現今台中縣大里市內新里；⁴³ 另一說林氏宗祠於清乾隆四十年（1775）開始建立，位於彰化縣貓羅堡內新庄，亦在今大里市內新里。⁴⁴ 創立年代何者為是，以及其發起創立者為何人，今已不可考。但林氏宗祠的創立，已有二百多年，應無疑義。

台中林氏宗祠，初名「林祿公祠」，奉祀晉林祿公、唐林九牧公。清道光十三年（1833），因大地震損毀廟體，廟身呈現傾頹之勢，於是暫將神牌安置於旱溪樂成宮聖母廟內。⁴⁵

2、林尚親堂

41 台中林氏宗廟，《林氏宗廟獻金裔孫芳名錄（二）》。

42 黃秀政，〈林氏宗族與清代台灣中部的開發：以台中林氏宗廟相關衍派為中心〉，頁124～128。

43 參台中林氏宗廟，〈林姓宗廟沿革〉（民國四十一年壬辰五月，鑄刻於宗祠內埕東廂石壁）；黃秀政計畫主持，《台灣中部林氏宗族的發展·期末報告書（附冊）》附錄七〈台中林氏宗廟碑：（一）林姓宗廟沿革〉，頁382。

44 不著撰人，〈林氏宗廟設立概況〉，《台灣新聞》（第一萬一千三百十六號，昭和九年八月二十八日）。林氏宗廟早期的原始資料，因地震、天災、廟址撤遷等因素，多已湮滅。本文關於林氏宗廟早期歷史，文獻不足之處，多以此篇新聞稿的內容作為補充。

45 不著撰人，前揭〈林氏宗廟設立概況〉。



清同治十年（1871），由林氏宗族中發展較有成就之林志芳、林文明等人，發起重建祖祠於旱溪（今台中市東區旱溪里），名為「林尚親堂」。⁴⁶

同治年間台灣中部林氏族人中，以太平林志芳家族及霧峯林家的發展最為突出。此二家族渡台祖皆為林石，具有血緣關係，故共同負責籌建「林尚親堂」事宜。二家族籌建「林尚親堂」之原為內新庄（今台中縣大里市）的林祿公祠於道光十三年傾圮，林志芳乃與林文明商議，協力移建祖祠於旱溪。當時族人「推林文明董其事，而以林志芳副之。」⁴⁷光緒九年（1883），林文明過世後，林志芳獨肩其任，「四出勸募，以底於成，且出其餘力。」⁴⁸可見旱溪林尚親堂初建時，是以霧峯林家為主，以太平林志芳為副；林文明死後，興建林尚親堂的工作，遂主要由太平林志芳家族負責。林氏宗祠於「林尚親堂」階段時，興建的主要家族及地區，以太平和霧峯地區為主，其中又以太平林家出力最多。

光緒二十一年（1895），旱溪林尚親堂因白蟻危害，廟體破損，再移神牌位於太平庄林鳳鳴宅。該宅業已倒塌，且經歷多次的都市道路重劃，其正確位置今已不可考。⁴⁹

四、林氏五大家族與林氏宗祠的重建

46 同註45。

47 林德和，〈先祖父志芳公家傳〉，收於林獻堂等修，《林氏族譜》（台中州：台中林氏宗廟初版，1935）。

48 同註47。

49 見台中林氏宗廟，〈林姓宗廟沿革〉。然〈林姓宗廟設立概況〉則言，林尚親堂因為為白蟻所侵，乃於光緒二十年（1894）將牌位暫移至太平林鳳鳴宅。此兩說相差一年。大正十年六月二十五日宗廟的會議紀錄，其中有一項載：「進主之日，旱溪舊廟所奉祀祖先神牌遺存太平庄林鳳鳴宅內之神像，可在當場而焚化，同時所彫新像之始祖及列祖神牌亦送至其所迎回來安置，委本宗廟而奉祀。」，此記錄為大正十年林氏宗祠大殿及兩廊將建好，並預備第一次進主時的會議記錄。可見旱溪林尚親堂倒後，確曾將祖先神主牌及神像置存林鳳鳴家宅。黃秀政、鄭喜夫、林紋如、林鉦昇訪問，林紋如、林鉦昇整理，〈宗廟董監事及相關人員訪談紀錄（23）：林家駒先生訪談稿〉，收於黃秀政計畫主持，《台灣省中部林氏宗族的發展（附冊）》，頁142。



（一）林氏五大家族的发展

清光緒二十一年（日明治28年，1895）五月，日本根據馬關條約取得台灣，展開長達五十一年之殖民統治。日治時期，因台灣成為日本殖民地，在社會階層方面最大改變就是日人、台人截然分為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這些外部環境的改變對林氏宗族都產生極大的影響，林氏族人應如何因應改變重新調整家族發展策略，乃成為其家族成員必須深思熟慮的問題。以下試就台中林氏宗祠相關衍派中發展得甚為成功的五個林氏家族加以論述，並兼述各家族對林氏宗祠重建的貢獻。

1、霧峯林家

霧峯林家在清代數次升降，至清末因朝棟與文欽分別受到台灣巡撫劉銘傳與台灣道劉璈的賞識與重用，而再度成為台灣中部首屈一指的官紳大家。乙未年（1895）台灣政權的遞遷，對霧峯林家而言無疑是另一次的重大挑戰與考驗。以下分就霧峯下厝（定邦支系）與霧峯頂厝（奠國支系）兩房支加以說明。

（1）霧峯下厝（定邦支系）：霧峯下厝可分為文察派下與文明派下。文察派下的林朝棟為清代道員，在聽聞日軍登陸台灣與唐景崧內渡的消息後，亦乘船內渡。由於朝棟在台的家業甚鉅，一時之間不可能完全移置內地；再加上他在中國大陸的影響力遠不及台灣，故必須重新思考家族發展的策略，並適時地進行調整，以延續家族日益好轉的發展。朝棟身為清廷官員，依令離台內渡，但其諸子家人並未皆隨之內渡。朝棟次子資銓曾參與明治三十九年（1906）台中櫟社的創立，對漢學詩文有許多貢獻。朝棟三子資鏗曾於大正二年（1913），在福建南靖創設墾牧公司，經營實業。大正四年（1915），資鏗加入中華革命黨，歷任閩南軍司令、粵軍第二預備隊司令、廣三鐵路局監督、福建省水利局局長等職。資鏗在投入革命運動時，曾命五弟資鏞變賣其在台的數百甲田產換取數十萬兩現金，以便接濟軍需。大正十二年（1923），因孫傳芳佔領福建，資鏗乃歸隱鼓浪嶼，專心經營南靖墾牧公司與華安疏



河公司。⁵⁰由資銓與資鏗的經歷觀之，資銓在詩文方面投注相當多的心力，在商界亦有些許參與；而資鏗則醉心於革命運動。兩人皆未涉足台灣政壇，此或許二人性格志向有關，但亦可看出朝棟一支無意重新踏入台灣政壇。

文明派下的林朝選（字紹堂），在乙未年日軍南下時曾出面率丁壯維持地方治安，安撫老幼婦孺。台灣總督府為了快速統治台灣，故積極以各種方式籠絡台灣士紳。朝選身為霧峯林家成員，在地方上亦負盛名，故成為日本殖民政府極力拉攏的對象。明治三十年（1897），台灣總督乃木希典以朝選平靖地方有功，賜六等單光旭日章。同年四月，再授紳章予朝選。⁵¹朝選諸子中，以長子資修（字幼春）最負盛名。資修曾參與台中櫟社以及「台灣文社」的創立，惟他雖醉心於詩文創作，但對世界與台灣局勢的發展亦相當關注，先後參與「台灣文化協會」、「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後來更因「治警事件」而被捕下獄。⁵²日治初期，台灣總督府曾欲拉攏朝選，後因朝選長子資修（幼春）積極投入文化啟蒙、民族自決與議會設置運動，難容於台灣總督府，故文明一支在日治時期的台灣政壇並無突出成就。

（2）霧峯頂厝（奠國支系）：霧峯頂厝可分為文鳳派下與文欽派下。文鳳派下的林朝璣（字烈堂，後以字行）生性豪邁，加上家境優裕，又無強烈的民族意識，故與日人相處和睦，頗受日本統治階層的倚重，歷任台中廳參事、州市協議會員等公職。他在工商業界亦甚活躍，歷任嘉義製腦組合長、台灣製麻會社董事、台中製糖會社社長（董事長）、台灣商工銀行取締役（董事）兼監查役（監察人）、禎祥拓

50 鄭喜夫，《台灣先賢先烈專輯（第四輯）林朝棟傳》（台灣台中：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79年4月），頁110～112、118～127。傅錫祺，《櫟社沿革志略》（台灣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文獻叢刊第一七〇種，1963年2月），頁1。楊越凱，〈林祖密傳〉，收於陳澤主編，《台灣先賢先烈專輯（第三輯）》（台灣台中：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78），頁118～120。

51 鷹取田一郎，《台灣列紳傳》（台北市：台灣總督府，1916年），頁184。

52 李筱峰，〈「海南才子」「小諸葛」林幼春〉，收於張炎憲、李筱峰、莊永明，《台灣近代名人誌（第四冊）》（台灣台北：自立晚報社，1987年12月），頁27、31～34。傅錫祺，前揭《櫟社沿革志略》，頁1。



殖株式會社社長等職。⁵³ 此外，烈堂對台中地區的中等教育亦有極大的貢獻，他與林獻堂等人於大正二年（1913）發起成立一所專收台人子弟的台中中學校（今國立台中第一高級中學），並捐出台中市新高町一百十八番地的壹萬伍仟坪土地（在今台中市北區，今國立台中一中校址）以為校地。⁵⁴ 昭和十一年（1936）又與地方士紳張煥珪、郭頂順等人發起籌設「私立台中商業專修學校」（今台中市私立新民高級中學）。⁵⁵

文欽在乙未割台時，因顧及母親曾氏年老不堪風濤，故打消內渡避難的打算，留居阿罩霧。日軍登台後，地方盜賊乘勢而起，文欽乃率鄉勇分巡地方，護閭閻、衛行旅，維繫地方治安。明治二十九年（1896），抗日份子襲擊南投、台中，霧峯鄰近鄉人亦欲乘機起釁，文欽聽聞其事，急遣人阻止，並分析利弊，眾人乃止。台灣總督府以文欽為前朝舉人，又為地方士紳，屢次欲任以公職，但皆為文欽所婉拒。⁵⁶ 文欽長子朝琛（字獻堂，後以字行），曾任霧峯區長、台灣製麻株式會社取締役（董事）等職。大正八年（1919）至昭和九年（1934），林獻堂成為台灣民族、政治、社會、文化運動的精神領袖，先後擔任啟發會會長、新民會會長、台灣文化協會總理、台灣民報社長、台灣地方自治聯盟顧問等職。⁵⁷ 由於獻堂深受台人所推崇，故為台灣總督府所忌。昭和十一年（1936），獻堂避居日本，逃避台灣總督府的迫害，共三年餘，始再返台。⁵⁸ 十五年（1940），獻堂返台後，台灣進入「皇民化」時期，日人為使台人日本化並促其投入戰爭，乃積

53 張永堂，《台中縣志·人物志》（台灣台中：台中縣政府，1989年9月），頁131。司馬嘯青，《台灣五大家族（上）》（台灣台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87年8月），頁103～104。

54 蔡培火、陳逢源、林柏壽、吳三連、葉榮鐘，《台灣近代民族運動史》（台灣台北：學海出版社，1979年初版），頁48。

55 童添安，〈創校五委員事略〉，收於《台中一中八十年史》（台灣台中：台中一中八十年史編纂小組，1995年5月），頁8～9。

56 林獻堂，〈先考文欽公家傳〉，收於林獻堂等修，前揭《台灣霧峯林氏族譜》，頁113～114。

57 日治時期台灣民族運動的三大支柱為「台灣文化協會」、「台灣民報」及「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而三者均以獻堂為首。

58 莊永明，《重修台灣省通志·人物志》（台灣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8年），頁381。



極籠絡台灣的政治運動領袖，故翌年獻堂再度獲選為總督府評議員、昭和二十年（1945）更被任命為貴族院敕選議員等職。⁵⁹

霧峯頂厝成員在日治時期的表現相當突出，如烈堂在政界、商界與教育界都有極高的成就與貢獻，而獻堂在各種政治、社會運動中都扮演著舉足輕重的地位。此外，霧峯林家與台中林氏宗祠的淵源甚深，早在清同治年間，文明即與志芳負責在台中旱溪重建林氏宗祠（林尚親堂）事宜。日治時期台中林氏宗祠的重建，霧峯林家亦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

2、大里杙林秋金家族

林秋金的父親林宛然，原居於外新莊（今台中縣大里市），因經商獲利甚豐，移居太平（今台中縣太平市），購置田產，成為歲入千石的地主。⁶⁰宛然死後，林秋金移居大里，自營布業，其規模成就雖未及乃父，但已可謂之有成。明治三十二年（1899），米價極賤，秋金乃乘機購入大量稻米。後遷居五張犁，改營米業。秋金善於經商，故於七、八年間獲利數萬金，乃歸老大里杙，被稱為大里首富。⁶¹

秋金富且好義，人稱「秋櫃長」。⁶²大正年間，大里內新、涼傘樹、五張犁等處，因交通未臻完善，加之多有溪流氾濫，阻礙行旅，物產運搬亦極不便，乃出私財，架設橋樑以濟之。鄉鄰有瑩獨無依者，或助金錢或施糧米，沾其惠澤者，不計其數。⁶³此外，秋金亦積極參與林尚親堂的重建與活動，於大正六年（1917）六月被推選為中部林姓大宗祠創立委員，後又歷任中部林姓大宗祠建築專務委員、財團法人林氏

59 戴寶村，〈士紳型政治運動領導者林獻堂〉，收於張炎憲等著，前揭《台灣近代名人誌（第四冊）》，頁65。

60 林秋金，〈先考宛然公傳略〉，收於林獻堂等修《林氏族譜·子慕公之派下集》（台中市：林氏宗廟，1935年），不著頁次。

61 林萬選、林振東，前揭〈家嚴秋金略歷〉，收於林獻堂等修，前揭《林氏族譜·子慕公之派下集》，不著頁次。

62 何佳修紀錄，〈太平鄉、烏日鄉、霧峯鄉、大里市分組座談紀錄〉，收於呂順安主編，《台中縣鄉土史料》（台灣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年12月初版），頁105。

63 林萬選、林振東，前揭〈家嚴秋金略歷〉，不著頁次。



宗廟總代等職。

3、大里杙林文華家族

林文華的父親林春光，於清光緒初年攜眷由原籍福建省漳州府詔安縣渡台，定居於彰化城內小西街；光緒十四年（1888），春光再遷居大里杙。⁶⁴ 林文華（1880～1923）兼通漢文、日文，曾任職於公學校，擔任教員；後轉任新聞記者、大里區書記保正、學務委員、地方委員囑託（顧問）、大里杙區長等職，皆有極好的表現，於明治四十四年（1911），獲佩授紳章。⁶⁵

文華在擔任擔任公職期間，積極地從事各種公共事業的推動，諸如：申請成立大里杙公學校、捐款協建台中中學校（即今台中一中）、協建大里福興宮、大里七將軍廟。文華在擔任公職之餘，亦兼營商業，如從事煙草買賣，並組織台中輕鐵會社、產業組合與信用組合。因其為人練達明敏，經商手法高明，乃於短期內成為大里地區僅次於林秋金的地方富豪。⁶⁶ 大正六年（1917）六月，文華被選為中部林姓大宗祠創立委員；九年（1920）被推選為林氏宗廟事務委員；十二年（1923），林文華病故。文華死後，其獨子嘉贅遠渡日本，養子德憐年幼，故該家族在地方上的影響力逐漸消退。

4、神岡社口林振芳家族

林振芳在清同治年間捐納例貢生，奏授中書科職銜及晉授同知職銜。他除活躍於中部地方，熱心參與公共事務外，亦被潭子、豐原、神岡一帶的林氏族人推舉為「火家長」，負責辦理族務。而其子柏璿與佐璿俱為清光緒年間的秀才。

64 黃秀政、鄭喜夫、林紋如、林鉦昇訪問，林紋如、林鉦昇整理，〈宗廟董監事及相關人員訪談紀錄（5）：林德憐先生訪談稿〉，《台灣中部林氏宗族的發展·期末報告書（附冊）》（台灣台中：財團法人台灣省台中林氏宗廟，2001年2月），頁53～54。

65 遠藤克己，《人文薈萃》（台北：遠藤寫真館，1921年4月），不著頁次；鷹取田一郎，前揭《台灣列紳傳》，頁197。

66 遠藤克己，前揭《人文薈萃》，不著頁次；黃秀政、鄭喜夫、林紋如、林鉦昇訪問，林紋如、林鉦昇整理，前揭〈宗廟董監事及相關人員訪談紀錄（5）：林德憐先生訪談稿〉，頁54



乙未割台，日軍南下駐屯台中時，人心惶惶，振芳、柏璿、佐璿父子三人代表鄉民與進駐的日軍斡旋，使地方政權得以順利的轉移。後振芳奉命擔任揀東上堡總理，並以安靖地方有功，獲台灣總督府賞授紳章六等勳。柏璿亦於明治三十年（1897）出任社口區長並獲授紳章，其在職八年，克守職責，治績甚佳，且熱心公益，屢捐鉅款。佐璿於三十年（1897）任辦務署參事並獲授紳章；三十八年（1905），擔任社口區庄長；四十三年（1901），改任社口區長。饒於資產，常傾心於地方公益，政績甚佳。⁶⁷

5、台中樹仔腳林耀亭家族

林耀亭為清朝生員。乙未割台後，耀亭挺身而出，與日軍周旋，居民咸賴以安。日治以後，耀亭歷任台中辦務署參事、樹仔腳區長、台中辦務署參議員、台中區長、台中市協議會議員等公職。此外，他在公共事務、教育文化及產業經濟等方面亦有突出的表現，例如：擔任中部林姓大宗祠創立委員、中部林姓大宗祠建築專務委員、財團法人林氏宗廟總代、台中中學校創立委員、台中市教育委員、保證責任台中厚生信用販賣購買利用組合組合長等職。⁶⁸

耀亭有二子，過房子啟賢，嘗為保甲聯合會長、區委員。親生子湯盤，早年畢業於台中公學校，後負笈於日本橫濱本牧中學，嗣後再入東京明治大學法科。湯盤返台後，在政治、社會、經濟、文化各方面亦有一定程度的參與，諸如：擔任兩屆台中市官選市議會議員、台中林氏宗廟副管理人、私立台中商業專修學校（今私立新民高級中學）理事、保證責任台中厚生信用販賣購買利用組合組合長等職。⁶⁹不過，湯盤的事業重心主要是放在產業經濟之上，他在保證責任台中厚生信用販賣購

67 鷹取田一郎，前揭《台灣列紳傳》，頁198。

68 呂嶽，〈林耀亭公略傳〉，收於板仔銅壺林氏族譜編纂委員會，《平和板仔銅壺林氏族譜》（台灣台中：板仔銅壺林氏族譜編纂委員會，1983年1月），頁405～406。

69 姜傑主編，《國民大會林代表湯盤追思錄》（台灣台中：林湯盤先生紀念事業委員會，1987年3月），頁345～351。



買利用組合的經營相當成功，使其在地方聲望快速地提昇；再加上昭和十一年，耀亭過世後，湯盤順利地承續耀亭在台中地區的地位與影響力。林耀亭家族不僅沒有因為大家長的去世而出現頹勢，反因湯盤專營合作事業有成，而使其家在台中地區的地位更加穩固，同時亦使湯盤個人在政經地位不斷提升，在日治末期甚至戰後的台中地區扮演相當重要的地位。

（二）林氏宗祠的重建

現今台中林氏宗祠的重建，緣起於大正六年（1917）三月，由林烈堂等一百多位林氏族人發起，議定「重建祖廟」。林氏宗祠初建之時，原欲名為「中部林姓大宗祠」，其發起人眾多，成員分佈的範圍也極廣，包括整個台灣的大中部地區，除現今台中縣市、彰化、南投外，亦包括新竹、嘉義、台南等地。林氏宗族何以要興建宗祠，推測其原因，可能為前述之「林尚親堂」，因白蟻危害廟體已損壞倒塌，祖先之神主牌雖暫存太平林鳳鳴家宅，但畢竟非長久之策。日治時代的大正年間，台灣政局趨於穩定，台灣中部林氏宗親遂以霧峯林家為首，邀集台灣中部地區較有成就的林氏宗族，發起重建祖祠。觀宗祠內所鑄刻對聯的字句：「祖功宗德子孝孫賢念分；胙人來事死事生無二事」、「孝友傳家遺風有十德；春秋告廟配饗重三仁」，或可知其用心一二。

林氏宗祠的重建過程，可謂一波三折，賴林姓宗族克盡其力，突破種種困難，同心協力始告完成。以下將林氏宗祠的重建過程，依時間先後加以考述。

林氏宗祠的重建，自大正六年三月由林烈堂、林子瑾等人發起後，同年六月十五日舉行第一次中部林姓宗祠建築發起人會議，共有一百多位林氏族人參加，會中除選出三十三位「創工委員」外，並通過：

- （1）林子瑾、林烈堂、林獻堂、林耀亭四人，為委員總代表。
- （2）林子瑾為「創工委員長」。
- （3）置林姓大宗祠建築事務所於林子瑾家



宅，宗祠一切事務委任其全權處理。⁷⁰

大正六年八月五日，以前述所選之四名總代，向台灣總督府請願建立「中部林姓大宗祠」，並向台中廳、南投廳、嘉義廳、新竹廳之區域內的林姓宗族，募集寄附金八萬九千四百圓。七年九月十三日，台灣總督府指令第二〇〇九九號許可其祠宇建立的請願，當時預定建立宗祠的位置，並非現址，而是在台中廳台中七二番地（日治時期花園町，今台中市東區振興里）。⁷¹

大正八年（1919）九月十八日，召開第二次中部林姓大宗祠建築發起人會，決議宗祠建築事宜，選舉林獻堂為「建築實行委員長」，林耀亭為副委員長，負責監督實行宗祠的建築；並選舉林祖藩為寄附金募集專務委員、林秋金為祠宇建築專務委員。同月二十九日，創立委員長林子瑾和建築實行委員長林獻堂進行交接，並將原設於林子瑾家宅中之林姓大宗祠建築事務所，遷至副委員長林耀亭家。

林氏大宗祠原定建於台中廳台中七二番地，大正八年十一月因該建地位置不適當，遂將建地變更至台中廳台中一五七三番地，即台中市老松町六丁目五筆及敷島町六丁目三筆之境內（宗祠現址）。⁷² 大正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進行奠基及寄樑，宗祠正式動土建築。不過此時宗祠建築物的構造，已與之前議定在花園町興建的宗祠設計全部不同。⁷³

大正九年一月十日，隨即開始交涉購買宗祠建築用地，可見宗祠興建之初，建築用地原非完整，而是逐漸擴大，故而有以上的記錄。當時負責交涉購買宗祠建築用地者已不可考，但廉價出售宗祠用地者，大約

70 林氏宗廟舊存資料，僅有大正八年九月十八日「第二次中部林姓宗祠建築發起人會議錄」，而缺第一次會議的會議資料，故推《台灣新聞》所載大正六年六月十五日，為第一次發起人會議時間。

71 林氏宗廟舊存資料，僅有大正八年九月十八日「第二次中部林姓宗祠建築發起人會議錄」，而缺第一次會議的會議資料，故推《台灣新聞》所載大正六年六月十五日，為第一次發起人會議時間。

72 林氏宗祠建地改移之因，一說因風水因素考量，認為花園町位置不佳，故遷其地於老松町。至於其位置由誰決定，據第二次中部林姓大宗祠建築發起人會議〈決議錄〉第三條載：「林秋金、林朝陽等提議創立委員長之創立事務完結，當再選建築實行委員長壹名，以繼承創立委員長而實行建築，並將新選擇地一事，一任建築實行委員長主裁。眾贊成。」，故宗祠老松町建地之決定，推測或為建築實行委員長林獻堂之主張。

73 建築執照於大正九年三月十日，台中廳第八一〇號許可令。不著撰人，前揭〈林氏宗廟設立概況〉。



有林來和、林汝梅、林泛舟等人。二月二日除前所選之諸委員外，宗祠再選任林景焜為建築委員、林文華為事務委員，參與宗祠的興築事務。

同年六月三十日，開始木工的工程，宗祠任命林秋金、林景焜負責監督全部職工進行工事。八月二日，又新任林琢如為委員，從事「寄附金募集」的工作。宗祠興建的經費，原為林子瑾、林烈堂、林獻堂、林耀亭四位委員總代表，向林姓宗族募集而來，但所募集的經費並不足夠，故宗祠興建後期的經費來援，多賴「寄附金募集委員」努力再向林姓宗族募集而來。但寄附金的募集並不容易，之後宗祠則是一邊興建，一邊向林姓族人募集經費。

同年十一月二十日，決定宗祠的坐向，三十日開始興土工，十二月十日於大殿步口西畔彫下九尺石柱。⁷⁴

大正十年一月三十日，宗祠大體架構完成，舉行隆重的上樑儀式⁷⁵，宗祠的建築此時已有一定規模。是年宗祠的正殿及兩廊業已完成，乃於十二月十六日舉行神主牌陞座式、進主典禮，並辦理初次的祭典。

大正十年六月二十五日，在宗祠大殿內舉辦獻金者臨時總會，出席者有林雨邨等七十七人，委任者三十七人，達全員半數以上之出席，選舉林獻堂為議長，其中有一項重要決定：「中部林姓大宗祠改名台灣林氏宗廟」，可見宗祠興建初時，原定名為「中部林姓大宗祠」；大正十年此次會議後，又決議改名為「台灣林氏宗廟」⁷⁶，但大正十二年宗祠內部之文書，卻又出現「林姓大宗祠」及「台灣林姓大宗祠」名稱混亂狀況。⁷⁷

74 林氏宗祠在從事此石工時，曾意外拾得古代遺物，「拾得劍形石器壹枝，身長一尺三寸八分，其闊約四寸五分，腰三寸五分，其柄厚五分，刃厚五厘，有識者據云古代未發現鐵金類之用，石器時代對遺物。」，此劍形石器何處，今已不可尋。前揭〈林氏宗廟設立概況〉。

75 李乾朗，《傳統建築入門》：「上樑儀式需擇日進行，並且由大木匠師主持一個隆重的儀式，整個建造過程有如儀典般。」（台灣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84年6月），頁53。

76 改名之事，後得到台灣總督府之許可，見大正十一年七月五日台灣總督指令第四四〇號。

77 大正十二年〈神牌題字回答書〉，台中林氏宗廟《神牌題字回答書（特等）》（台灣台中：編印者，未刊行）。



大正十一年（1922）二月，決定宗祠前殿（三川殿）之工程，開始著手進行。但宗祠此時面臨經費不足的問題，需設法增籌建築經費，故於四月二十六日定出〈建築費後援金規則〉，以籌措經費。當時由林階堂為首，共有四十一名林姓宗親，參與了這次的捐款。

同年十月二十日，原設在副委員長林耀亭家中的林姓大宗祠建築事務所，遷至宗祠內。宗祠於建築過程中，各項工程固然委諸匠師，但也必需有監工之人，因此委員長林獻堂請林耀亭、林秋金、林澄坡等為負責人，監督宗祠職員的工作；工程方面，全部的木工及一部分石工，請林景焜監督；全部塗工及一部分石工，則請林振東監督，並請林秋金擔任全部建築工程的總監督。

大正十二年十二月九日，前殿舉行上樑式。十三年二月八日，前殿開始進行油漆彩繪的工程。六月五日，決定著手興建右畔護室、下山五間，此工事請林秋金、林岱全擔任監督，並擔當執行。建築工程於十四年十二月六日完工。

林氏宗祠的興築過程中，一直面臨經費短缺的困難。大正十一年已有一次擴大募款；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宗祠再次召開建築委員會，會中建築委員長林獻堂呼籲林姓宗族克盡其力，早日解決建築經費短缺問題。

昭和三年（1928）三月一日，決定興建西畔護室過路亭之隔中磚壁，並大殿屋頂上、工程由後面開各間屋上小室以通氣的工事。此建築工程由林景焜、林選負責監督，並請林志喜擔任顧問。

昭和四年（1929）三月十七日，決定建築東畔護室，但直到同年十月六日，方請林振坤、林志喜、林金東、林汝漢監督執行此工事；十二月三日，決定東西畔頂山護室的增築及改造西畔護室間樓，計此年共完成增建東室九間，西室頂山四間及屋頂的幼（細）工，昭和五年廟



體終於全部完工，計自大正八年興工，前後歷經十二年始告完成。⁷⁸

由上述可知，台中林氏宗祠的重建，乃林氏宗族自發性的集結，重建過程面臨的最大問題為經費短缺，一邊興建、一邊籌錢，成為當時建築委員們最大的難事，或有為節省經費而更改宗祠建築材質之事。宗祠從大正六年林烈堂、林子瑾等發起至昭和五年完工，前後長達十四年，所興築的林姓宗祠，不但形制廣大，且當時所聘之工匠皆為名著一時之人，故廟內不論是正殿、三川殿、屋脊、廊柱，所作木彫、石彫、彩繪皆栩栩如生，有極為精彩的表現。⁷⁹

五、林氏宗祠的組織與活動

（一）管理組織

日治時期，林氏宗祠的管理組織歷經三次變革，首先是大正六年（1917）初定的總理制，其次是大正八年（1919）的委員長制及理事長制，第三是昭和十年（1935）以後的管理人制。⁸⁰ 以下就歷次變革分別加以論述。

1、總理制時期（大正六年至大正八年，1917～1919）

林氏宗祠重建之初，原名為「林姓大宗祠」，其事務所初名為「中部林姓大宗祠建築假事務所」，後來改為「台灣林姓大宗祠事務所」。大正六年（1917）林姓大宗祠以林子瑾為創立委員長，籌劃創建之初，針對宗祠的管理，作出成文的規定，即《中部林姓大宗祠管理規則·重建章程》。⁸¹ 根據此管理規則所定，宗祠的主要代理人為總理，

78 黃秀政計畫主持，《台灣中部林氏宗族的發展·期末報告書（下冊）》，頁290～291。

79 同註78，頁293。

80 日治時期，林氏宗祠一直爭取成立財團法人，但始終未獲台灣總督府的同意。直至戰後，民國六十八年（1979）預定成立法人機構，並訂定《財團法人台灣省台中林氏宗廟組織章程》，翌年五月獲准成立，始由管理人制改為董、監事制。黃秀政計畫主持，《台灣中部林氏宗族的發展·期末報告書（下冊）》，頁319、325～326。

81 《中部林姓大宗祠管理規則·重建章程》（台中州：中部林姓大宗祠建築假事務所，大正六年七月）。



故為總理制。此時宗祠的管理組織主要分為兩部份，一為事務管理部，一為地方代表會議。事務管理部為執行部門，地方代表會議為監督部門，二者相輔相成。

事務管理部掌理宗祠的一切事務，置幹部四十二名，計總理一名、副總理兩名、理事九名、評議員三十名，諸幹部不得互相兼任。幹部之選舉，由召開地方代表會議時，林姓中有被選舉資格且與宗祠有關係者，以投票方式決定；其任期為三年。事務管理部的會議分為三類，一為總會：分為定期總會與臨時總會，以事務管理部全體幹部組成。二為理事會：以總理、副總理、理事等組成之。三為評議會：以全數評議員組成，分為定期評議會及臨時評議會兩種，前者每年冬季常例祭日前後召開，後者由評議長臨時召集。

地方代表會議的主要職責為選舉及彈劾事務管理部諸幹部；並分割區域選舉地方代表會議代表員，其區域由總會或委員會決定。地方代表員選舉區域係依各區域捐獻金額高低，劃分為七級，各級代表名額不等。地方代表員由出席總會的幹部選舉之；地方代表會議議長、副議長於地方代表會議時由代表員互相選舉產生，其任期為六年。地方代表會議分為兩類，一為臨時聯合會議：以地方代表員及事務管理部全體幹部組成；二為地方代表會議：以各地方代表員組成。⁸²

2、委員長制及理事長制時期（大正八年至昭和十年，1919～1935）

大正八年（1919）至昭和十年（1935）間，此時期林姓大宗祠的管理制度分為兩部分。林姓大宗祠（建築）的管理部分為委員長制，林氏宗祠（宗祠財產）的管理方式為理事長制；另並選出設立者總代，代表宗祠與政府交涉。大體而言，此時林姓大宗祠的管理雖有兩個機構，但主要的管理方式應為委員長制。⁸³

82 黃秀政計畫主持，《台灣中部林氏宗族的發展·期末報告書（下冊）》，頁320～321。

83 例如昭和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林氏宗廟事務所公文，所署名為「林氏宗廟建設委員長林獻堂」，收錄於《春秋祭通知公文及財產計算書》（台灣台中：財團法人台灣省台中林氏宗廟，未刊行）。



委員長制開始於大正八年九月林姓大宗祠第二次發起人會議，會中選舉林獻堂為建築實行委員長、林耀亨為建築實行副委員長、林祖藩為寄附金募集專務委員、林秋金為祠宇建築專務委員。此後，建築委員及各專務委員迭有變革。因應林姓大宗祠的建築，建築實行委員長林獻堂掌理林姓大宗祠建築事宜。林姓大宗祠興建完成後，林獻堂仍沿用此名稱管理宗祠，直至昭和九年十二月始廢此名義。⁸⁴ 委員長制的會議，僅委員長會議一種，該會主要為委員長與副委員長之會議，決議宗祠重要事項。如大正十二年三月十二日委員長、副委員長會議，決議第二期工事、募款、進主、土地所有權轉移等事項。

理事長制開始於大正十二年（1923）十月林姓大宗祠總會的會議，推舉林獻堂為理事長、林耀亨副之，林澄坡為專務理事，林烈堂、林秋金二人為理事，監事林瑞騰、林梅堂、林朝陽諸人，其他評議員十八名由理事長指定，分別為林祖藩、林子欽、林文亭、林東、林景焜、林階堂、林資彬、林雨邨、林成、林嘉興、林全福、林竹溪、林月汀、林清福、林垂拱、林維朝、林岱全、林瓊彰。理事及監事的任期為終身制，此為林氏宗祠管理沿革中，僅有的終身制；至於評議員的任期，則未有明文規定。理事長制的會議分為兩類，一為總會：分為定期總會與臨時總會；另一為專務委員會議：各專務委員針對宗祠獻金招募、建築、宗祠相關事宜的會議。⁸⁵

3、管理人制時期（昭和十年至昭和二十年，1935～1945）

昭和十年（1935）至昭和二十年（1945）係日治時期最後十年，此時期的管理制度既無明文依據，只能就現存資料推斷，此時期應為管理人制。原「林姓大宗祠事務所」，此時期改名為「林氏宗廟事務所」。昭和十二年（1937），管理人（林獻堂）、副管理人（林澄

84 林姓大宗祠昭和九年十二月十八日公文載：「林姓大宗祠本職名義及其印章，過去使用的林氏宗廟建設委員長林獻堂名義及如下圖公印，至本日止全部不使用而廢止之。」，收錄於《「財團法人」暨「寺廟」有關法令》（台灣台中：財團法人台灣省台中林氏宗廟，未刊行）。

85 黃秀政計畫主持，《台灣中部林氏宗族的發展・期末報告書（下冊）》，頁321～324。



坡、林湯盤）之名義首次出現，作為林氏宗祠的對外負責人。其中管理人一名，副管理人名額則以兩名為限。管理人制的會議分為兩類，一為獻金者總代會：總代會主要為審查宗祠財產計算及收支決算書報告，並決議宗祠大事。獻金者總代會的會議記錄，首見於昭和十三年獻金者總代會的開會通知，審查昭和十二年度宗祠財產計算及收支決算書報告。昭和十六年二月十日，獻金者總代名稱及總代制宣告結束。另一為評議員會議：該會議分為定期評議員會議與臨時評議員會議兩種。定期評議員會議主要為審查林氏宗祠財產計算、收支決算書，及其他重要事項；臨時評議員會議則為討論、決議宗祠臨時性的重要事項。⁸⁶

（二）祭祖活動與編修族譜

1、祭祖活動

祭祀是宗祠活動的主要內容，也是鞏固宗族組織的方法。宗族建立宗祠，首要目的即為了祭祖；祠祭是祖先崇拜的體現，起著凝聚宗族的作用。台中林氏宗祠的林姓族親眾多，分佈極廣，各族親藉著參與宗祠的祭祀活動，達到鞏固族親情感的作用，並體現慎終追遠、光宗耀祖的目的。林氏宗祠的祭祀活動分為三種：

（1）每月初一、十五的參拜：農曆每月的初一、十五，宗祠舉行例行性的參拜，董、監事多會參與。此項例行參拜活動也歡迎林氏族親參與。

（2）重要節日的參拜：林氏宗祠於每年的重要民俗節日，例有祭祖活動。農曆正月初一過年、正月十五日元宵節、五月五日端午節、七月十五日中元節、八月十五日中秋節、九月九日重陽節等皆是。在這些節日，宗祠例必祭祀祖先，其祭拜禮儀一如前述每月初一、十五例行性的祭祀活動；惟祭品較為隆重，由宗祠準備三牲（或五牲）、四果、鮮花等進行對祖先的祭祀。

86 同註85，頁324～325。



(3) 春、秋大祭：春祭與秋祭的祭祖活動可謂林氏宗族對祖先表達追思與崇敬的具體表現，也是宗祠每年兩次最重要的重頭戲。農曆正月十二日為林氏宗祠的春祭日期，農曆十一月十二日則為秋（冬）祭日期⁸⁷，每年到這兩個日子，林氏宗祠均會舉行盛大的古禮祭祖活動。春祭與秋祭的儀式並無重大差別，但就典禮的進行而言，春祭時多了進主典禮的活動；秋祭則只是單純的祭祖典禮，並未附加其他的活動。若單就春、秋祭祭祖典禮的差別來說，儀式、過程皆相同，所不同者只在於春、秋祭祝文內容的差異。

所有祭祖典禮的相關活動結束後，宗祠將祭品如仙桃、麵線、水果等，分給林氏族親攜回，據說吃了以後可蒙受祖先的保佑。⁸⁸宗祠並且準備了鹹粥當作點心，林氏族親可在吃完鹹粥後再回家。至於與祭人員，宗祠則另辦桌作為稿賞，以感謝所有主辦及協辦人員的辛勞，並藉此聯絡族親的感情。⁸⁹

2、編修族譜

昭和九年（1934），宗祠議定以林獻堂、林資修（幼春）為編輯，林耀亭、林秋金為校正，林烈堂為發行者，重修林姓族譜。《林氏族譜》由林獻堂主編，林階堂任發行，總譜及部分分譜於昭和十年十二月十八日付梓，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發行；霧峯林家的分譜則於昭和十一年（1936）九月二十八時付梓，同年十月三日發行。

此次林氏宗祠所協助印刷、編輯、發行之《林氏族譜》，包括林氏

87 林氏宗祠於農曆十一月十二日的秋祭典禮，早期稱為「冬祭」，如昭和十三年十二月十四日林氏宗廟事務所函知宗廟獻金者公文，即載：「謹訂昭和十四年一月二日午前十時在本宗廟舉行今年『冬祭』典禮。」

88 林氏宗祠為鼓勵林氏族親參與祭祖大典，早期發放糕餅交換卷。如昭和十三年（1938）至昭和二十年（1945）間，每次春、秋祭之前，宗祠函知林氏宗親春、秋（冬）祭典時間，並隨函附「春祭糕餅交換卷」、「秋祭糕餅交換卷」，於祭祖典禮結束後可「憑卷交換糕餅」。又據林時敏先生追述：兒時曾與祖父參與春、秋大祭，祭典結束後，在宗廟享受一頓大餐，宗廟並且會發放紀念品給參與祭典者，如茶壺、茶杯等。黃秀政、鄭喜夫、林紋如、林鉦昇訪問，林紋如、林鉦昇整理，〈宗廟董監事及相關人員訪談紀錄（27）林時敏先生訪談稿〉，《台灣中部林氏宗族的發展·期末報告書（附冊）》，頁158。

89 黃秀政計畫主持，《台灣中部林氏宗族的發展·期末報告書（下冊）》，頁329～338。



宗祠進主各派下裔孫。每一家族皆有一相同總譜，詳載林氏始祖、各朝代林氏名人及重要林氏重要分支；部分家族另有一分譜，記載各派下祖先及裔孫分支狀況。族譜的編修不僅可使林氏族親知道自己的源流，更可藉此加強彼此的關係。⁹⁰

六、結論

宗親觀念與祭祀祖先是傳統中國社會的特色。由於宗親觀念濃厚，宗族成員多能獲得同宗族人的照顧，而其宗族成員間的倫理關係、權利與義務關係等，亦均有詳盡的規範；由於祭祀祖先虔誠，宗祠、祠堂或宗廟的興建極為普遍。二者對傳統中國社會的穩定，均曾作出積極的貢獻。

林姓為台灣第二大姓，林姓族人約佔全台總人口數的8%。台灣中部台中市、台中縣、彰化縣及南投縣四縣市之地，自明末清初之際，即陸續有自閩、粵兩省東渡進入開發拓墾的林氏族人，他們在此生息繁衍，在此從事開發，並在很多方面作出卓著的貢獻，譜寫台灣中部地方史志的重要篇章。

隨著遷台日久，台灣中部各處聚居的林氏族人先後發展成若干規模不一的家族或宗族。如清代中後期的大里杙林石家族、社岡社口林振芳家族、潭子大埔林林其中家族等，以及日治時期的霧峯林家、木里杙林秋金家族、大里杙林文華家族、神岡社口林振芳家族、台中樹仔腳林耀亭家族等，各家族或宗族彼此之間的往來頗為密切，他們均積極參與林氏宗祠的創建，其家族成員多進主至林氏宗祠，對林氏宗祠的組織與運作貢獻良多。

台中林氏宗祠規模宏大，是台灣近代建築史上相當重要的建築作品之一，為台灣其他宗祠所不及。其興建過程先後經過林祿公祠、林尚親

90 同註89，頁340。



堂、林氏宗祠三個階段，而在最後一個階段之林氏宗祠施工中，林祿公祠、林尚親堂及林九牧公等祭祀公業全體派下裔孫議決，同意合併於林氏宗祠，同時原祭祀公業派下成員均轉為林氏宗祠「信徒」。

林氏宗祠自大正六年（1917）重建以來，其管理組織歷經多次變革：由大正六年初定的總理制，到大正八年的委員長制及理事長制，再到昭和十年以後的管理人制。各階段的管理組織，均分別設有執行部門與監督部門，二者相輔相成。由於管理組織的健全，因此日治時期林氏宗祠的運作相當順暢，對林氏族人的凝聚力發揮很大的作用。

林氏宗祠對祭祀活動素極重視，每年的春、秋大祭均隆重舉行，參拜亦從未間斷。宗祠各族親透過參與宗祠的祭祀活動，不但體現了慎終追遠的傳統美德，並且發揮凝聚宗族的作用，達到鞏固族親的目的。另外，宗祠編修《林氏族譜》，不但可使林氏族人知道自己的譜系源流，更可藉此加強彼此的關係。

綜上所述，可知台灣中部的林氏宗族在日治時期雖面臨各種外部環境的改變與挑戰，但因台中林氏宗祠的創建與經營，不但達成了慎終追遠、光宗耀祖的建祠初衷，而且發揮凝聚宗族的作用，使林氏族人的情誼不但未因日本的殖民統治而減弱，反而更加團結在一起。因此，台中林氏宗祠對日治時期台灣中部林氏宗族的發展，實具有重要的意義。



引用書目

一、基本史料

不著撰人

1934 〈林氏宗廟設立概況〉，《台灣新聞》第一萬一千三百十六號。

中部林姓大宗祠建築假事務所

1917 《中部林姓大宗祠管理規則》。台中州：該事務所。

司馬嘯青

1987 《台灣五大家族（上）》。台灣台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

台中一中八十年史編纂小組

1995 《台中一中八十年史》。台灣台中：編纂者。

台中林氏宗廟

1932 《林氏宗廟獻金裔孫芳名錄（二）》。鑄刻於宗祠內埕石壁。

台中林氏宗廟

1952 〈林姓宗廟沿革〉。鑄刻於宗祠內埕東廂石壁。

台中林氏宗廟

未署時間 《神牌題字回答書（特等）》。台灣台中：編印者，未刊行。

江日昇（清）

1960 《台灣外記》。台灣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文獻叢刊第六〇種。

吳樹平等點校

1991 《十三經注疏》。中國北京：燕京出版社。

呂順安主編

1994 《台中縣鄉土史料》。台灣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李乾朗

1984 《傳統建築入門》。台灣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林氏大宗譜編輯委員會編

1985 《林氏大宗譜》。台灣台中：台灣省各姓歷史淵源發展研究學會。



林獻堂等修

1935 《林氏族譜》。台中州：台中林氏宗廟。

林獻堂等修

1935 《林氏族譜·子慕公之派下集》台中州：台中林氏宗廟。

林獻堂等修

1971 《台灣霧峯林氏族譜》。台灣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文獻叢刊第二九八種。

板仔銅壺林氏族譜編纂委員會

1983 《平和板仔銅壺林氏族譜》。台灣台中：編纂者。

姜傑主編

1987 《國民大會林代表湯盤追思錄》。台灣台中：林湯盤先生紀念事業委員會。

郁永河（清）

1956 《裨海紀遊》。台灣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文獻叢刊第四四種。

財團法人台灣省台中林氏宗廟

未署時間 《「財團法人」暨「寺廟」有關法令》。台灣台中：編印者，未刊行。

財團法人台灣省台中林氏宗廟

未署時間 《春秋祭通知公文及財產計算書》。台灣台中：編印者，未刊行。

高拱乾（清）

1960 《台灣府志（第三冊）》卷十。台灣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文獻叢刊第六五種。

張永堂

1989 《台中縣志·人物志》。台灣台中：台中縣政府。

張炎憲、李筱峰、莊永明

1987 《台灣近代名人誌（第四冊）》。台灣台北：自立晚報社。

莊永明

1998 《重修台灣省通志·人物志》。台灣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許雪姬計畫主持

1994 《台中縣建築發展：民宅篇田野調查總報告書》。台灣台中：台中縣立文化中心。

連橫

1985 《台灣通史》。台灣台北：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

陳炎正

1982 《神岡鄉土志》。台灣台中：台中縣詩學研究會。

陳炎正主編

1998 《台灣傳統建築典範》。台灣台中：各姓淵源學會。

陳澤主編

1978 《台灣先賢先烈專輯（第三輯）》。台灣台中：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傅錫祺

1963 《櫟社沿革志略》。台灣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文獻叢刊第一七〇種。

黃秀政計畫主持

2001 《台灣中部林氏宗族的發展・期末報告書》。台灣台中：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中部辦公室與財團法人台灣省台中林氏宗廟。

遠藤克己

1921 《人文薈萃》。台北：遠藤寫真館。

劉枝萬編纂

1962 《南投縣人物志》。台灣南投：南投縣文獻委員會，南投文獻叢輯第九種。

蔡培火、陳逢源、林柏壽、吳三連、葉榮鐘

1979 《台灣近代民族運動史》。台灣台北：學海出版社。

鷹取田一郎

1916 《台灣列紳傳》。台北市：台灣總督府。



二、專書及論文集

山中彰二等著

1945 《台灣文化論叢（第二輯）》。台北市：清水書店。

尹章義

1983 《張士箱家族移民發展史：清初閩南土族移民台灣之一個案研究（1702～1983）》。台灣台北：張士箱家族拓展史研纂委員會。

周憲文

1957 《清代台灣經濟史》。台灣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研究叢刊第四五種。

施添福

1987 《清代在台漢人的祖籍分布和原鄉生活方式》。台灣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張勝彥、吳文星、溫振華、戴寶村著

1996 《台灣開發史》。台灣台北：國立空中大學。

曹永和

1979 《台灣早期歷史研究》。台灣台北：聯經出版公司。

莊英章

1977 《林圯埔：一個台灣市鎮的社會經濟發展史》。台灣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專刊乙種第八號。

陳其南

1986 《台灣的傳統中國社會》。台北市：允晨出版公司。

曾少聰

1998 《東洋航路移民：明清海洋移民台灣與菲律賓的比較研究》。中國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

黃秀政

1999 《台灣史志論叢》。台灣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黃富三

1987 《霧峯林家的興起：從渡海拓荒到封疆大吏（1729～1864年）》。台灣台北：自立晚報社。



楊緒賢

1979 《台灣區姓氏堂號考》。台灣台中：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鄭喜夫

1979 《台灣先賢先烈專輯（第四輯）林朝棟傳》。台灣台中：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齒松平原著、程大學等編譯

1983 《日據時期祭祀公業及在台灣特殊法律之研究》。台灣台中：日本東都書籍株式會社藏版，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

三、期刊論文與學位論文

李棟明

1976 〈台灣人口姓氏分佈之研究〉，《台灣文獻》，第27卷2期，頁131～161。

黃秀政

2001 〈林氏宗族與清代台灣中部的開發：以台中林氏宗廟相關衍派為中心〉，《興大歷史學報》，第12期，頁99～131。

黃秀政、林鉦昇

2004 〈日治時期林氏宗族在台灣中部的發展：以台中林氏宗廟相關衍派為中心〉，《興大人文學報》，第34期下冊，頁871～927。

黃富三

1984 〈清代台灣之移民的耕地取得問題及其對土著的影響（上）〉，《食貨月刊》復刊第11卷1期，頁19～36。

洪麗完

1985 〈清代台中開發之研究（1683～1874）〉。台灣台中：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